

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

青铜器 陶瓷器 墓葬壁画

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 编著



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

青铜器 陶瓷器 墓葬壁画

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 编著



文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铜器 陶瓷器 墓葬壁画 / 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
编著. -- 北京: 文物出版社, 2016.5
(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)
ISBN 978-7-5010-4582-2

I. ①青… II. ①大… III. ①青铜器(考古)-中国
-北魏-图录②古代陶瓷-中国-北魏-图录③墓室壁画
-中国-北魏-图录 IV. ①K876.412 ②K876.32
③K879.4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86835 号

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

青铜器 陶瓷器 墓葬壁画

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 编著

责任编辑: 张小舟

书籍设计: 特木热

责任印制: 梁秋卉

出版发行: 文物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

网 址: www.wenwu.com

邮 箱: web@wenwu.com

印 刷: 北京金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 本: 635×965 1/16

印 张: 12.125

版 次: 201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10-4582-2

定 价: 800.00 元

本书版权独家所有, 非经授权, 不得复制翻印



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

青铜器
陶瓷器
墓葬壁画



主编

张庆捷

(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)

副主编

杨婷

摄影

厉晋春

文字

王亮 李杲 赵晓凤

线图

江伟伟



北魏石堂石床与壁画 张庆捷 / 6

彩色图版

- 1 铜鎏金铺首衔环 / 24
- 2 铜鎏金忍冬纹铺首衔环 / 26
- 3 铜鎏金忍冬纹铺首衔环 / 28
- 4 铜鎏金忍冬纹铺首衔环 / 30
- 5 铜鎏金忍冬纹铺首衔环 / 32
- 6 铜鎏金人物纹铺首衔环 / 34
- 7 铜素面鐎斗 / 36
- 8 铜素面鐎斗 / 38
- 9 铜弦纹鐎斗 / 40
- 10 铜素面鐎斗 / 42
- 11 铜弦纹鐎斗 / 44
- 12 铜弦纹鐎斗 / 46
- 13 铜魁 / 48
- 14 解兴石堂左壁壁画 / 50
- 15 解兴石堂前壁壁画 / 51
- 16 解兴石堂后壁壁画 / 52
- 17 解兴石堂右壁壁画 / 53
- 18 石棺壁画及石刻文字 / 54
- 19 石棺壁画(局部) / 55
- 20 石棺壁画(局部) / 56
- 21 墓葬壁画(局部) / 58
- 22 墓葬壁画(局部) / 58
- 23 墓葬壁画(局部) / 60
- 24 墓葬壁画(局部) / 61
- 25 墓葬壁画(局部) / 62
- 26 墓葬壁画(局部) / 63
- 27 墓葬壁画(局部) / 64
- 28 墓葬壁画(局部) / 65
- 29 墓葬壁画(局部) / 66
- 30 墓葬壁画(局部) / 67
- 31 棺板画(局部) / 70
- 32 棺板画(局部) / 71

- 33 彩绘陶甲骑具装俑 / 72
- 34 彩绘陶骑马俑群 / 74
- 35 彩绘陶胡人俑 / 76
- 36 彩绘陶侍从俑 / 78
- 37 彩绘陶风帽俑 / 80
- 38 彩绘陶文吏俑 / 81
- 39 彩绘陶按盾武士俑 / 82
- 40 彩绘陶按盾武士俑 / 84
- 41 彩绘陶武士俑 / 86
- 42 彩绘陶执盾武士俑 / 87
- 43 彩绘陶执盾武士俑 / 88
- 44 彩绘陶笼冠女俑 / 89
- 45 彩绘陶甲冑俑 / 90
- 46 彩绘陶侍卫俑 / 92
- 47 彩绘陶男侍俑 / 93
- 48 彩绘陶男侍俑 / 94
- 49 彩绘陶侍女俑 / 95
- 50 彩绘陶男侍俑 / 96
- 51 彩绘陶男侍俑 / 98
- 52 彩绘陶侍女俑 / 99
- 53 彩绘陶男侍俑 / 100
- 54 陶胡俑 / 101
- 55 彩绘陶武士俑 / 102
- 56 彩绘陶侍卫俑 / 103
- 57 彩绘陶男侍俑 / 104
- 58 彩绘陶男侍俑 / 105
- 59 彩绘陶男侍俑 / 106
- 60 彩绘陶男侍俑 / 107
- 61 彩绘陶侍女俑 / 108
- 62 彩绘陶侍女俑 / 109
- 63 釉陶俑 / 110
- 64 釉陶侍女俑 / 111
- 65 彩绘泥俑头 / 112
- 66 彩绘泥俑头 / 112
- 67 彩绘泥佛头 / 113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68 彩绘陶镇墓兽 / 114 | 103 釉陶四系罐 / 156 |
| 69 彩绘陶镇墓兽 / 115 | 104 釉陶罐 / 158 |
| 70 彩绘陶牛 / 116 | 105 石磨盘 / 160 |
| 71 彩绘陶牛车 / 116 | 106 陶磨盘 / 162 |
| 72 彩绘陶马 / 118 | 107 陶磨盘 / 164 |
| 73 彩绘陶马 / 118 | 108 陶磨盘 / 166 |
| 74 彩绘驮物陶马 / 120 | 109 釉陶磨盘 / 168 |
| 75 彩绘陶骆驼 / 120 | 110 陶灶 / 170 |
| 76 彩绘陶骆驼及牵驼俑 / 122 | 111 釉陶灶 / 172 |
| 77 陶狗 / 124 | 112 陶井 / 174 |
| 78 陶狗 / 126 | 113 陶井栏 / 176 |
| 79 彩绘陶羊 / 126 | 114 陶仓 / 176 |
| 80 彩绘陶猪 / 127 | 115 彩绘陶甗 / 178 |
| 81 釉陶狗 / 128 | 116 深腹玻璃杯 / 180 |
| 82 釉陶猪 / 128 | 117 直口玻璃杯 / 181 |
| 83 釉陶猪 / 129 | 118 绿玻璃小瓶 / 182 |
| 84 釉陶羊 / 129 | 119 绿玻璃浅腹盘 / 183 |
| 85 青釉胡人驯狮俑 / 130 | 120 浅腹玻璃碗 / 184 |
| 86 彩绘陶堆塑连枝灯 / 132 | 121 长颈玻璃瓶 / 185 |
| 87 釉陶九枝灯 / 134 | 122 磨花玻璃杯 / 186 |
| 88 釉陶灯 / 135 | 123 鎏金银耳杯 / 188 |
| 89 陶高柄灯 / 136 | 124 玻璃环 / 189 |
| 90 水波纹红陶壶 / 137 | 125 素面金耳环 / 189 |
| 91 灰陶盖罐 / 138 | 126 螺旋纹金耳环 / 190 |
| 92 灰陶盖罐 / 139 | 127 红宝石戒指 / 190 |
| 93 釉陶盖罐 / 140 | 128 金坠饰 / 191 |
| 94 釉陶盖罐 / 142 | |
| 95 釉陶壶 / 143 | |
| 96 釉陶壶 / 144 | |
| 97 釉陶罐 / 146 | |
| 98 釉陶壶 / 147 | |
| 99 釉陶四系罐 / 148 | |
| 100 釉陶甗 / 150 | |
| 101 釉陶罐 / 152 | |
| 102 釉陶罐 / 154 | |

〔二〕山西省考古研究所：大同市考古研究所、山西大学考古系：《大同操场城北魏建筑遗址》，《考古学报》，2004年第4期。

北魏石堂石床与壁画 / 张庆捷

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以收藏北魏器物为主，北魏藏品中，种类丰富，屡见精品。如石刻馆陈列着一个虎首门墩石，与永固陵出土门墩石近似，长60厘米、宽47厘米、高42厘米（图一），据说出土于大同操场城遗址。操场城遗址位于大同市操场城街，北距火车站一公里左右，面积数十万平米，是北魏皇宫遗址。数年前，配合基本建设，我们曾在那里抢救性发掘三次。第一次发掘是2003年，首战告捷，发掘出操场城北魏一号遗址，发现一个宫殿遗址和汉代遗址叠压在一起，找到并证明了北魏宫殿区遗址和汉代平城的准确地点^{〔1〕}。2007年和2008年，又在一号遗址北面发掘两次，再次发掘出北魏宫殿遗址和大型粮窖遗址，确定了北魏宫殿方位和范围，还发现战国平城的遗物。几次的发掘，出土大量砖瓦等建筑构件，也有少数柱础，但是体量有限，没有遇到如此气派的门墩石。不知这个虎首门墩石出土于操场城什么具体位置，毫无疑问，这是北魏主要宫殿的遗物，由此门墩石，可窥视该宫殿的壮丽规模。

文物是历史文化的载体，是古老城市与民族的名片，皇宫遗址又是文物中屈指可数的珍品。遗址不可再生，皇宫只有一个，万望珍惜善待仅存的操场城区域，创造机会，让考古工作者按照自己的规划科学地发掘、保护操场城，深信能够发现更多重要遗物和遗迹，增加对平城北魏宫殿遗址的认知，为这个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增添砝码和魅力。



图一 石门墩

〔2〕王银田、刘俊喜：《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堂壁画》，《文物》2001年第7期。

〔3〕山西省考古研究所、大同市考古研究所：《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2001年7期。



图二
大同北魏宋绍祖墓石堂

感慨暂停，言归正传。

徜徉石刻馆，几个石堂与石床引起我的兴趣。石堂是北魏很有特色的文物，不论素面的，或是彩绘加雕刻的，都值得认真捕捉和解读其中储存的各种信息。好的石堂，有雕绘，有文字，还有精美石床，从外观到内涵，都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。

北魏流行石堂，定都平城期间，很多达官贵人逝世，采用了石堂葬具。与前代石葬具相比，石堂外形与木构建筑更接近。平城较早发现的一个石堂，是智家堡石堂。1997年，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南郊智家堡抢救性发掘一座北魏墓，内有一石堂。长约2.5米、宽约1.5米、高约1.5米，单檐人字坡悬山式顶，由数十块不同形状的砂岩料石拼合组成。椁壁四周、梁架及顶部皆绘有壁画或图案，有墓主人宴饮图、侍者图、牛车鞍马图等，这次发现，首次吸引学界注意到北魏石堂及其石堂壁画^{〔2〕}。

十几年来，北魏平城遗址及其周围，已经发现很多石堂和石棺，少数有纪年或绘画雕刻，大多是无雕刻、无文字、无绘画的“三无”产品。不过三无产品也很重要，至少传递出北魏葬俗重视石堂的信息。

至今为止，大同出土最精美石堂是北魏宋绍祖墓出土的，石堂外观呈木构三开间悬山顶式殿堂建筑，前廊后室，最长处约3.48米、最宽处约3.38米、最高约2.4米，由百余件青石构筑而成，墙壁外雕刻数十个铺首，墙壁内有绘画（图二）^{〔3〕}。

其次是和平元年（460年）张智朗石堂，该石堂很典型。悬山式顶，外有雕刻、匾额和刻文，内有绘画和石床。张智朗乃毛祖德之妻，毛祖德原是南朝著名将领，被俘归降北魏，北魏给他封官娶妻。张智朗石堂有门有额，是北魏唯一有门额的石堂。门额上有“千年富贵”四字。研究中国匾额的发展演变，这是一件重要的早期实物资料。

北魏定都平城时期已发现的石堂，形制各异，按形制大致可分三类：一类以张智朗墓

石堂为代表，仿木构古建筑，悬山式顶，出檐较大。智家堡石堂和御昌家园工地出土石堂、华宇建设工地出土石堂皆属于这种类型，这种类型数量最多。二类以宋绍祖墓石堂为代表，不仅是仿木构古建筑，悬山式顶，出檐较大，而且还带前廊和廊柱，是前廊后室的结构，石壁雕刻也是精雕细镂。不过也有具前廊后室却不精致者，2010年出土于阳高县王官屯的北魏太安三年石堂、本馆收藏的带廊柱石堂，皆形制普通。三类即以本馆收藏的解兴石堂为代表，外形简单，石棺出檐，彩绘木构古建筑的一些重要构件，如斗拱、角柱、横枋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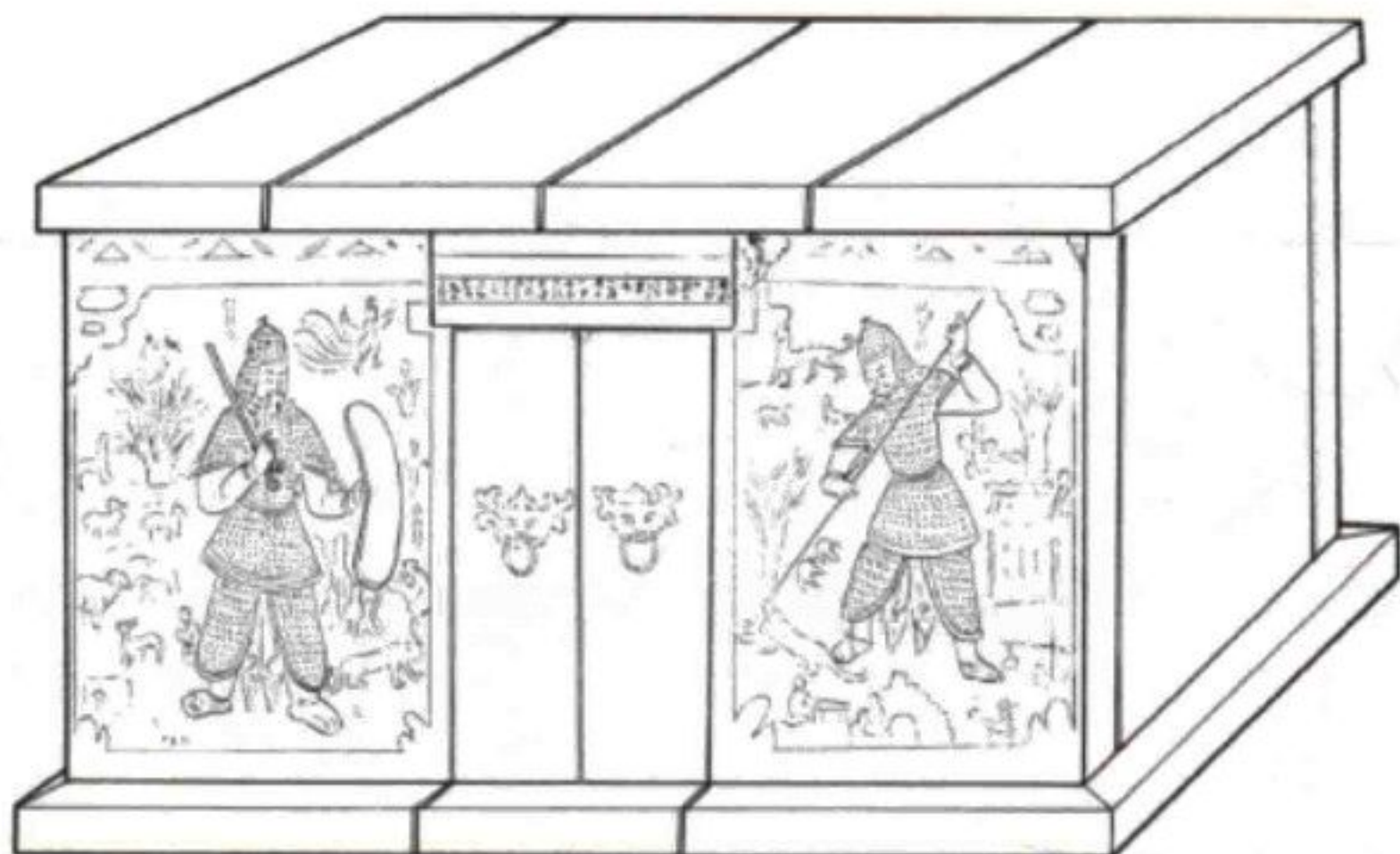
将以上石堂按照时代排队，阳高县王官屯出土太安三年（457年）石堂最早。其次为解兴石堂，为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（458年）。张智朗石堂为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（460年），时间稍后，宋绍祖墓石堂为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（477年），时间更晚。其余石堂没有纪年，不知准确时间。洛阳出的石堂大致也在这三类内，只是更多石壁装饰由彩绘改为线雕。由纪年石堂观察，大体时间较早的，外形也较简单；时间较晚的，形制与雕刻也较精，由前至后，呈现出一条由粗放简单到精妙复杂的演变曲线。

本馆收藏的解兴石堂不仅是较早的一个，而且形制特殊，有文字，有绘画，信息量丰富，亮点甚多，值得专门探讨。

这个石堂，如果没有题记，一般人会将它看作石棺。实际上，它的外形是一个标准长方体石葬具，长216厘米、宽105厘米、高118厘米，由30来块石板组成，顶部为平顶，从左到右，平铺着4块厚约10厘米的石板。顶部四周均有出檐，前面出檐最多，为11厘米，后面与两侧出檐6厘米。石板的正面出檐部分，下面彩绘朱红色椽子。

石堂四壁由12块石板组成，后壁为两块宽110厘米、高93厘米、厚10厘米的石板拼接成，在与侧面石板相交之处，有一道宽约8厘米、深约1.5厘米的浅槽，以固定侧面棺板。左右壁各由一块宽89厘米、高98厘米、厚8厘米的石板组成。正壁较复杂，

由6块石板组成。正面左右两侧各有一块宽80厘米、高93厘米、厚约10厘米的石板，中间为门，门为一块宽50厘米、高90厘米、厚10厘米的石板，门板上有门楣，长60厘米、宽16厘米、厚约10厘米。



图三 解兴石堂结构图



图四 石堂墓志

石堂底座也为石板拼接而成，四周底座为宽约 27 厘米、厚约 11 厘米、长度 40 厘米至 110 厘米的石条组成，石条内侧各有 3 厘米宽的浅槽，以铺设 5 厘米厚的石板。四周石条四周，在与四壁石板交合处，还开有宽 8 厘米、深约 1.5 厘米的石槽，以固定四壁石板。整个石堂没有榫卯，仅在前后上下有槽，互相套合，挤压四壁石板，达到固定作用（图三）。

该石堂有彩绘壁画，做法是在石壁先刷一层白灰，然后彩绘。前后左右四壁均有壁画，其中一幅壁画朝外，三幅朝内。依据内外画面，将画面朝外的定为前壁，其他左右两壁定为左壁和右壁，剩余一壁定为后壁。

各壁画面内容不同，前壁彩绘角柱、横梁、斗拱、大门、铺首、武士、纹饰和一些人物、动物组成生活和生产场面。最令人惊喜的是，在门楣上，由右至左，左行竖写一段墨书文字（图四），这段文字乃先写后刻又用墨描的。文字仅 50 余字，但不宜识读，初次识读结果是：“唯大〔代〕太安四年，岁次戊戌，四月甲戌朔六日己卯。解兴鹰、门人世夫妻王（亡），造石堂（室）一区之神枢（祠），故祭之。”后一种识读是，“唯大〔代〕太安四年，岁次戊戌，四月甲戌朔六日己卯。解兴，雁门人也。夫妻王（亡），造石堂（室）一区之神枢（祠），故祭之。”两种释读断句中，“王”均当理解为“亡”，作“王”读不通，作“亡”可读通，当是通假字；石堂的“堂”字，颇似“室”字，仔细观察，上边确是三点相连，只是左边一点稍短又有些剥落，但是对照最初照片，还是能看到脱落痕迹；神祠之“祠”，既像“祠”，也像“枢”，根据偏旁，暂定为“枢”。关键是两种断句中，有的字不易辨识，如解兴后面的字是“鹰”还是“雁”？南北朝时雁字写法很多，有的与鹰类似，“广”下面有“亻”有“鸟”，但是不见“隹”，而鹰字是三者均有。因此这个字很关键，如果此字考定为“雁”，则这种断句完全可以成立。后得殷宪、刘旭先生相助，又得慕尼黑大学汉学系宋鑫先生提供线索，感到后一种可能更合适。因为南朝刘宋解叔谦就是雁门人，《南史》卷七十三《解叔谦传》：“解叔谦字楚陈，雁门人也。母有疾，叔谦夜于庭中稽颡祈福，闻空中语云：此病得丁公藤为酒治即差。”此事以后演化为二十四孝中的“叔谦乞藤”。由此可定，男性墓主人是解兴，原籍雁门（今山西代县）。

北魏也称大代，北魏出土墓志中，常见自称大代之例。太安，是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年号，

〔4〕山东省石刻艺术馆编、蒋英炬、杨爱国、蒋群著《朱鲋石室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14-15页；王昶《金石萃编》第七、二十一卷，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，1980年版。

〔5〕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院编著、杨军凯著《北周史君墓》，第45页，文物出版社，2014年。

〔6〕赵超《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》，第2页，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82年。

〔7〕尤振尧、陈永清、周晓陆《东汉彭城相缪宇墓》，《文物》1984年第8期。

拓跋濬是太武帝拓跋焘的孙子，他的年号共四个，分别为兴安（452年2月-454年7月）、兴光（454年7月-455年6月）、太安（455年6月-459年12月）、和平（460年正月-465年5月）。太安四年，即公元458年，通过这段文字，可知墓主人姓名为解兴，在史书中缺载，具体身份不详，就文字推测，他去世时间为太安四年四月六日。

仿木构建筑外形的石葬具，以前多沿用“石槨”旧称，也有少数学者称为石室，如清代黄易、王昶等学者就称东汉仿建筑石葬具为石室^{〔4〕}。但是大多数考古学者仍然称此类石葬具为“石槨”。2003年，西安北周史君墓出土一件石槨，门楣上有粟特文和汉文刻文，汉文首句为篆书：“大周凉州萨宝史君石堂”^{〔5〕}。说明北周称墓内石槨为“石堂”。如今，在北魏太安四年石堂文字中又发现“石堂”名称，可证北朝始终将仿木构古建筑石葬具命名“石堂”。不过我认为，石室和石堂两者均是仿木构古建筑石葬具的恰当名称。《说文解字注》七篇注曰：“古者前堂后室。”堂室性质相同，同为居住建筑，不过位置不同而已。实际上，称“石堂”或“石室”均不为错。《宋书·礼制二》也载：“汉以后天下送死者奢靡，多作石室、石兽、碑铭等物。”可为佐证。更重要的是，“史君石堂”和“解兴石堂”的发现，表明石葬具也可以称为“石堂”，并非只有地上祠堂，才享有“石堂”或“石室”之称。

石槨也是一个历史名称，由来已久，文献记载，东周已有石槨，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载：“周失纲纪，蜀先称王，有蜀侯蚕丛，其目纵，始称王，死，做石棺石槨，国人从之，故俗以石棺槨为纵目人冢。”

《太平广记》援引《西京杂记》，记述战国时代魏襄王使用石槨之事云：“广川王去疾，好聚无赖，少年无赖，毕戈无度，国内冢藏一皆发掘。……魏襄王冢，文石为槨，高八尺许广狭容四十人，以手扞槨，滑液如新，中有石床、石屏风。”说明至迟战国，石槨已在中原出现。考古界称仿建筑石葬具为石槨，也是因为石槨中或有石床，或有棺，因此该名称并没有错，可以继续沿用。在这里，石堂、石室、石槨三者名称不同，实指一物，可谓同物异名。在古代，另外存在木槨，先秦两汉木槨形制与北朝不同，无建筑外形，因此只能称“槨”，不能称“堂”或“室”。此例提醒我们，槨在不同时代，形制有所变化，这在具体使用时要加以甄别。

石槨文字汉代已经出现，就目前所知，汉代石槨有“故雁门阴馆丞西河圜阳郭仲理之槨”和“西河圜阳郭季妃之槨”^{〔6〕}诸刻文。墓中刻文汉代也有，如彭城缪宇墓后室横额上就镌刻着墓主缪宇的姓名、官职、丧葬日期等^{〔7〕}。从此以降，墓槨刻文不绝如缕，延续到北魏。

仿古代建筑的石棺，最早见于东汉，多分布在今四川地区，棺上雕刻内容与中国传统的丧葬观念有关，主要是仙境、升仙、墓主日常生活、历史人物故事、驱鬼镇魔、珍禽异兽、祥花瑞草等。

历史步入北魏，石堂的建筑形式不论数量还是类型质量，均达到一个新的高度。石堂上也出现许多时代性很强的纹饰，如虎面铺首、忍冬纹、莲花等。

北魏迁都洛阳后，仍然使用石堂葬具，但题材和表现手法均发生变化。题材除继承传统的墓主人宴饮图、牛车鞍马图外，还出现孝子故事图等新题材；表现技法由绘画多改为线雕。最著名的是出土于洛阳的北魏宁懋石室，石室内外均阴刻着许多宴饮图、牛车鞍马图、庖厨图与孝子故事图。

因为造价昂贵，石堂使用范围有限，仅用于官僚阶层部分人中。到隋唐时期，石堂仍被官僚阶层使用，也是墓葬中身份等级的象征。

太安四年石堂尽管形似石棺，由于石棺上彩绘出木构堂宇的形式，因此也称为“石堂”。该石堂有画有刻有书，不像初创时期的产品，隐约透露出，北魏石堂的出现或产生时间，可能还要更早。目前在大同，在太安之前的纪年墓葬，最早的是沙岭北魏壁画墓，时为太武帝拓跋焘太延元年，遗憾的是，该墓没有石堂。寻找更早的石堂，还需要耐心等待新资料出土。

太安四年石堂中曾有石床，可惜搬迁时已被扰乱，只有一堆石条，缺乏原始图像，不易复原。

北魏墓葬重视石床，石床是石堂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即使没有石堂的墓葬内，也往往修建石床或砖床，石床意即床榻，也是居所最重要家具，有家有床，才称得上完备舒适（图五）。北魏石床形制千差万别，或大或小，有简有繁。如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收藏的一件石床，长186厘米、宽135厘米、高38厘米；宋绍祖墓石堂的石床平面为凹字形，北侧长2.39厘米、宽188厘米、中心宽103厘米、高31厘米。形制和尺寸均



图五
大同南郊田村北魏墓石床

不相同。北魏棺床质量有高低之别，质量高的棺床正面，雕刻有各种各样的纹饰（图六），有人物、动物、飞禽、器物或花草，甚至有人兽搏斗图等。数量最多者是忍冬纹和连珠纹，其次是莲花纹和葡萄纹，诸如此类纹饰的背后，都有丝绸之路的背景或故事。

还有一些纹饰，主要源于鲜卑文化，如兽面纹饰，是北魏平城时期纹饰的主要题材之一。兽面纹或兽面纹瓦当先秦时期早已出现，但可能与北魏的同类不同源，先秦流行抽象的兽面纹或象征性的兽面纹；北魏的则写实性很强，形象来自大自然的猛虎。北魏兽面纹的特点，表现的是肌肉和发自骨子里的威猛，如石床和瓦当的兽面纹饰，面目凶猛，双目突起，龇牙如刀，虎虎生威。溯其源头，当与鲜卑早期的游牧生活有关。鲜卑出于大兴安岭，擅长狩猎，因此对山林百兽之王的猛虎充满敬畏，倍加崇拜。崇敬的延伸，是将虎首形象作为装饰品，企图起到保佑和镇恶避邪的作用。

兽面纹饰除用于石床外，还广泛用于瓦当和铺首。在北魏瓦当、铺首中，兽面纹饰所占比例很大。需要指出，在北魏铺首中，兽面纹构成复杂，写实性不如瓦当。北魏兽面纹饰影响深远，历代传承，直到明清，铺首和瓦当还有兽面形象，然而演变中失去了北魏的生动和气势。历代兽面纹瓦当，艺术性无出其右者。

石床纹饰，种类最丰富，最动人者，还要说忍冬纹和连珠纹，它们无处不在，灵动非常。在最普通的家用器皿如陶器上，在本馆收藏的北魏石灯和金银首饰上（图七），在佛像背光甚至大型石窟内外，到处可见忍冬纹和连珠纹的秀姿。



图六
馆藏北魏石床图案

(8) 赵瑞民、刘俊喜：《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出土漆皮文字考》，《文物》2006年第10期；张庆捷：《北魏破多罗氏壁画墓所见文字考述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07年第1期。



图七
馆藏北朝连珠纹首饰

葡萄纹也是北魏石床常见纹饰之一，在云冈、永固陵和墓葬遗址，都有葡萄纹现身。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石床和墓砖上，都有葡萄纹饰（图八）。我总认为，葡萄纹和忍冬纹不同，传入的不单单是图案，而是实物栽培技术与酿酒技术。太武帝攻占河西，迁入平城大量粟特人，其中当不乏种植葡萄与酿制葡萄酒的高手，一定会让他们发挥所长，在平城地区种植葡萄，为鲜卑人酿制美酒。北魏一度送葡萄酒给南朝，极可能就是自己酿制的。据北朝人撰写的《齐民要术》，北魏时，葡萄已在今山西、河北普遍种植，追根溯源，源于北魏引入葡萄种植技术。

石堂文字位置也很值得考察，因为它涉及到墓志的演进。目前所见北魏最早的墓内纪念文字，当是沙岭壁画墓太武帝延和元年的棺板漆皮文字。这是在棺板漆皮上发现的一段文字：“□□□□□元年，岁次豕韦，月建中吕，二十一日丁未，侍中、主客尚书、领太子少保、平西大将军□□□□破多罗太夫人□□□□□□于[弟]宅[迄]于中秋八月将祔葬□□□□于滨官易以□□□□□□慈颜之永住□□□□□□无期□□之德冥天殁极□□□□莫□□哀哉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岁月云。”学者考证，文中的元年，是太延元年^[8]。从内容看，叙述了墓主人的姓氏、官职爵位、埋葬年月，后人愿望等，具备了墓志要素。

其次是太安三年（457年）的《尉迟定州石刻铭文》，该铭于2009年冬出土于大同市阳高县王官屯镇电建工地，铭文内容是：“太岁在丁酉，二月辛巳朔，十六日丙申，



图八
馆藏北魏葡萄纹石床座

〔9〕殷亮：《北魏尉迟定州墓石刻画文及其书法》，见《平城史稿》第165-171页，科学出版社，2012年。

〔10〕持志：刘俊喜：《毛德祖妻张智朗石椁铭刻》，《中国书法》，2014年第4期。

〔11〕张庆捷：《大同发电厂北魏九号墓及其壁画题记研究》，《日本龙谷大学国际文化研究所纪要》13期，2011年。

步胡豆和民莫堤尉迟定州，以官绢六匹从六臣常买得初文侯莫陈染干买砖八千枚，即日毕了。砖保无识忍寒盗，若有识忍呵责，仰买得葬自至地下七春，洛书断了，券破之后，若不丕休。时人张坚固、李定度知。”^{〔9〕} 该内容很新颖，记载了墓砖买卖的时间和砖的数量、价格、买卖双方和保人姓名等。相当于一个买卖契约。此契约刻于石堂封门外侧中部，严格地说，虽起到一定纪念作用，但距墓志内容相去甚远。必须经过推析，才可大致划定墓主人死亡时间和身份。

再次便是解兴石堂上的文字，该段文字内容过于简化，只说某时间，为某某造石堂一区。没有展开说明墓主人身世和官职。文字简单，等同于墓铭砖。这段文字的位置很特殊，刻于门楣之上。

还有和平元年张智朗石堂文字，刻于石堂前壁右侧，如下：“惟大代和平元年，岁在庚子七月辛酉朔，乙酉日。故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镇远将军、汝南庄公、荃阳郡阳武县安平乡禅里里毛德祖妻太原郡榆次县张智朗，年六十八，遘疾终没。夫刊石立铭，书记名德，垂之不朽。欲使爵位荣于当年，美声播于来叶。若后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；千载之下，知有姓字焉。”^{〔10〕} 这篇文字写的很清楚，已是较完整的墓志内容。

最后是大同富乔发电厂出土和平二年北魏壁画墓，该墓文字写在甬道东侧靠近墓门的甬道壁上，共四列，由上到下，由左到右书写，每字大约6厘米，前面左侧上方墨书“和平二年”四个小字，其后正文皆为朱书，其文曰：“大代和平二年，岁在辛（丑），三月丁巳朔，十五日辛未，□□（散）骑常侍、选部（尚书）、安乐子梁拔胡之墓。”^{〔11〕} 几句话简洁干净，只说了时间、墓主人姓氏、官爵等。此墓没有石堂，志墓文字被写在甬道壁上的仅此一例。

通过以上5个例子，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认识：

- 一是五个墓都没有专门的墓志。
- 二是五个墓的纪念文字都直接或间接起到墓志的作用。
- 三是五个墓的纪念文字都刻写在壁上或门上。
- 四是五个墓的时代都在献文帝和孝文帝之前。

根据以上四项情况推测，北魏早期没有形成较标准的墓志，而只见纪念性文字，这些文字或长或短，没有固定格式。

实际上，在这时期，墓葬纪念文字还有两类，第一类是墓碑，有文成帝兴安三年（454年）《韩弼真妻王亿变碑》、和平三年（462年）《邸府君之碑》等；第二类是墓砖刻文，如明元帝永兴元年（409年）“王礼斑妻與”墓砖、天安元年（466年）《叱干渴侯墓砖》等。墓碑一般位于墓室外，墓砖铭内外都有。将这两种纪念文字都加进来综合考察，仍

〔12〕赵超：《墓志溯源》，《文史》
第十一辑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。

然得出北魏墓志尚未定型的结论，同时折射出北魏丧葬制度建设比较滞后，志墓形式还没有章法。

关于墓志的起源演变，学界众说纷纭，仁智各见，至少有秦、西汉、东汉、魏晋、南北朝几种观点。赵超认为“正式的墓志，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条件：

- 一、有固定的形制。
- 二、有惯用的文体或行文格式。
- 三、埋设在墓中，起到标志墓主身份及家世的作用。”〔12〕

依照这些条件，赵超将墓志的产生及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：

一、滥觞期，自秦代至东汉末期。这一时期存在着志墓的风习，但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墓志形式。

二、转化期，魏晋至南北朝初年。这时墓志开始正式形成，但还常以小碑或柩铭的形式出现，变化较多，或称碑，或称铭，或称柩铭等。墓志这一名称尚未使用。

三、定型期，南北朝时期。墓志的名称正式出现，形制和文体相对固定，并成为当时墓葬中普遍采用的丧礼用品。

赵超对墓志提出的几个条件及其三个时期的划分，既注意到形制发展过程，也兼顾内容和内容格式的发展过程，笔者认为，他提出的几个条件及其三个时期的划分是目前最系统科学的。其他学者或确定在某个时期，或以某个墓志为产生代表，皆不如赵超之说经得起推敲验证。

研究北朝墓志发展过程，可以清晰看出，即使在北朝，不同阶段，特色也不相同。比如北朝平城时期，根据目前出土墓志看，仍然处于滥觞期和转化期。

就大同及其附近县区已发现北魏墓葬看，大多数墓是既无墓志，亦无墓铭砖，如大同南郊市电焊器材厂发掘北魏墓葬167座，无一座有墓志或墓铭砖。据目前已发现北魏平城时期的墓志初步统计，有墓志、墓铭砖和墓碑的是少数，所占比例不超过一成。由于比例低，稀者为贵，有文字的墓葬越显珍贵。

就此一成不足的墓葬纪念文字加以分析，以上举例的墓葬纪念文字，如果按照赵超的划分意见，应该属于滥觞期和转化期。再细加区别，似乎还可以分为两个时期，文成帝以前的属于滥觞时期，“这一时期存在着志墓的风习，但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墓志形式”。文成帝以后至孝文迁洛时期，属于转化时期，“这时墓志开始正式形成，但还常以小碑或柩铭的形式出现，变化较多，或称碑，或称铭，或称柩铭等。”在平城，文成帝以后新出现了孝文帝延兴二年（472年）《申洪之墓铭》、延兴四年（474年）《钦文姬辰墓铭》、孝文帝太和八年（484年）《司马金龙墓表》、太和八年（484年）《司马金龙墓铭》等。

墓表犹墓碑，或在地上，或在墓道；墓铭即墓志铭，是新的志墓形式。因此说，文成之后至孝文迁都，新出现的墓铭正是转化期的特有现象。

通过以上事例可见，北魏太武帝与文成帝时期，死者的姓名、生平在墓内是刻写在砖上或壁上。文成之后，墓内记述死者的生平事迹由壁上转移到专门的载体——具有一定形制的石板上。这时的墓铭形制上与墓碑接近，形制上圆下方，没有发展成正方形或长方形，亦无相配的志盖，谈不上成熟，再次证明这个阶段属于转化时期。

迁都洛阳后，成熟的墓志正式出现，形制上，以正方形为主，还出现志盖；内容与格式讲，内容成熟，格式基本固定，有志有铭，志为散文体，主要书写墓主姓氏、身份、家世、死亡时间、埋葬地点及事迹等。铭为韵文，主要写评悼赞颂之语。如本馆收藏的北魏正光二年程玮墓志、永安元年陈隆墓志等，从形制到格式均达到如此标准。

总之，北魏平城时期，墓志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，完成了中原数百年的转变，既是多民族融合的成果，也是北魏政权开放和推行汉化政策的结晶，同时，为墓志在北魏洛阳时期定型成熟奠定了基础。

毫无疑问，绘画也是石堂的组成部分。太安四年石堂前后左右四壁都有绘画，前壁绘画在外面，左右壁和后壁画面在里面。为便于叙述，我们把正面壁画编号第一幅，右侧为第二幅，后壁为第三幅，左壁为第四幅，依次介绍分析。

第一幅画位于石堂正面，画面朝外，内容比较复杂，细观之后，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最上部的和左右两侧的梁柱斗拱、两扇门和门框等建筑构件，和石堂相结合，表示这是一个三开间、有出檐的建筑。第二部分，是立于大门两侧的两个武士，这是该画面的中心和主要内容，寓意保护死者安全。左面武士，身着头盔铠甲，脚穿系带麻履。右手持长刀，左手持盾。盾牌下方，绘着一头人首怪兽，雄性，面有胡须，头发高束，背有尖刺，与右面怪兽相对。右面武士，也是身着头盔铠甲，脚登系带麻履。双手握一长矛戟，刺向前下方，矛戟下方，是一头口吐长舌，背长尖刺的庞大凶恶的怪兽。这两个位于下方的怪兽，相当于俑中的镇墓兽。武士是这幅画的主要内容，相当于墓室壁画的镇墓武士。如在大同沙岭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壁画墓，墓室甬道两侧和侧壁的壁画中，也有类似的举刀持盾和持矛戟的镇墓武士和镇墓兽。画面的第三部分，是武士上方的树木、花草、飞禽和异兽。左面武士后方，绘一株粗壮大树，树枝茂密，其间栖息着许多飞禽和猴子。武士头部前方，绘一个站立的人首凤身的神禽，人首为女相，象征雌性，有长尾三根，展开双翅，头上有发饰。右面武士后方，也绘一株粗壮大树，树枝茂密，其间有许多飞禽，在其前方，也绘着一株小树，上有数只小鸟。武士头部前